

=====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三一）·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九九期（zk1911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亡灵祭坛】	潘光旦之死（上）	王友琴
【难忘岁月】	复旦往事（选载之十）	吴中杰
【研究动态】	美国中文学学术季刊《记忆·REMEMBRANCE》创刊	王复兴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亡灵祭坛】

潘光旦之死（上）

· 王友琴 ·

潘光旦，1899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1913年入清华学校，因运动受伤截去一腿。1922年留学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又成为“批判斗争”对象，从1966年夏天开始，一直在该校“专政队”中“劳改”，1967年6月10日病重去世。

潘光旦先生在去世前，用四个S开头的英文词，即“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描述自己的一生。

1，四个S：SURRENDER，SUBMIT，SURVIVE，SUCCUMB

1967年，潘光旦教授病危。那时正是文革仍然在轰轰烈烈进行的第二年。他从1966年文革开始后，一直就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批判斗争”对象，被编入学校的“牛鬼蛇神劳改队”里，不断受到侮辱以至殴打。他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在文革中成为“反动学术权威”。除了在精神上思想上遭到攻击之外，他本来腿有残疾，加上年事已高，遭受长期“斗争”，对他来说在体力上也分外难以承受。

去世之前，在最后的日子里，潘光旦的一位老友叶笃义来看望他。早年他们都曾经留学外国，取得学位，然后回到中国工作。潘光旦告诉老友，他自己的活法，从前一直实行三个S的政策，这三个S是指三个以S开头的英文词，SURRENDER，SUBMIT，SURVIVE，意思是：投降、屈服与活命。叶笃义说，那就继续实行吧，继续投降，继续屈服，继续活命。潘光旦说，现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会有第四个S。我的三个S政策要变成四个S了。这第四个S是SUCCUMB。

SUCCUMB这个词的意思是灭亡。

潘光旦在1967年6月10去世。

在文革时代，这样的临终谈话不可能流传出来让人知道，因为这肯定会被当作“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被追究，连他的老友也会被牵连进去，陷入牢狱之灾甚至死刑。只是在文革以后，他的老友才把这段对话说了出来。后来笔者从潘的家人处得到证实，其时潘光旦已经去世近三十年了。

屈服、投降、活命、灭亡，这四个S的说法，相当震动人。

这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才可能有的独特的表述方式。他曾经留学国外，精通英文。他才会用一组英文词语来描述他的生活。这样的表述绝不是一个懂英文的中国人的文字游戏，而是来自一个他这样身份和经历的人的内心深处的思考。他这样的人，曾经被冠以“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后得到“平反”，他们又被称为“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爱国知识份子”。中国报纸上的这些称号，是权力当局出于不同的需要对他们作的不同说法，但是他们的内心想法，其实我们知之甚少。而不被了解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或者没有表达渠道，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说出来，更不能公开发表。潘光旦的遗言在他死亡多年后，文革结束了才由他人来说出。而即使是在文革后，活着的人自己仍然不能直接说出有关的想法，而要借死者的言辞来表达他们那一代人的痛苦和辛酸。

这种震动更来自这个说法和历史事实的高度吻合。潘光旦和他同代人的经历，就是这样的。这不是俏皮话，也不是刻薄的牢骚，而是对一大批学者的人生经历的非常现实主义的描述。这四个S，不但是潘光旦教授一个人，而且是一群与他身份相似的同代学者的生平概括。仅仅由于在权力的高压下，这样的说法在公众生活中长期不被准许，所以流行于人们口头的是另外一些不同的东西。一些真实的说法长久地被淹没和掩盖，一旦说出来也就显得特别。

关于潘光旦，在他死亡23年之后，在文革结束14年之后，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是这样说的：

潘光旦：1899—1967，1899年8月13日生于江苏宝山罗店镇。1913—1922年在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1922—1926年留学美国，先在纽汉普夏州哈诺浮镇达茂大学学生物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在上海任大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光华大学教授。1934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教授。1952年—196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

这一词条，至少遗漏了两项重要的事情。一项是他在1957年被定为“右派份子”，被当作社会的“敌人”。一项是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和虐待，他拖着残腿，长期在校园“劳改队”中被强迫劳动，到他病重身死的时候，他的身份也还是“牛鬼蛇神”。另外，也没有说出他在1952年离开清华大学到了中央民族学院，是因为他所从事的社会学研究已经被政府取消，他的离开是强制性质的，而不是学者们通常会有更换学校和研究机构。

这样的简历能告诉读者的，好象是一个一生平安的正常典型的学者，没有什么异常，和其他年代其他国度的学者生涯没有太大不同。读了这样的小传，人们决不会想象传主潘光旦本人，是想要用四个S来描述他的生活和死亡的。

在百科全书这个词条中的每一项，都不假。没有什么是编造出来的。但是也不能说这样的描述是真实的。尽管这个条目没有捏造什么，但是缺了很多事实。由于隐瞒和删除了他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的东西，于是他的整个人生也显得很不一样了。这是一种特别的谎话，特点是，好象不假，可是也不真。这是一种特别的说谎话的方式。

在文革时代，谎话到处可见。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明明当时物质供应匮乏，人民生活困难，报纸却总是说“形势大好”“市场繁荣”。另一类典型的例子是，很多人根本没有敢反对毛泽东，也被定罪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说假话是文革的最大特色之一。文革时代说谎的特色之一是说一些不存在的东西，从不存在的“市场繁荣”到捏造出来的个人的各种罪状，几乎俯拾皆是。在文革之后，关于文革历史本身，出版方面受到严格控制，依然不能说真话。不过，文革后的官方媒体较少编造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也许得算一种进步。但是不告诉人们发生过的坏事情，显然也是掩盖劣迹和拒绝真正修正的表现。抹去和消除历史事实，这是一种新的谎言形式。

本文回顾潘光旦和他的同代学者，是怎么从1950年代的投降屈服活命，来到了在文革中的全面灭亡。

文中所用的材料，如果是二手的，都一一写明出处。其他未注明的故事则来自笔者的调查。笔者的调查，包括阅读大量的文字记录材料以及和上千名文革的经历者谈话。

2，“检讨”和“交代”的年代：“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和“肃反运动”

回看1949年以后在中国的大学里发生了一连串事情，我们会对四个S的说法有具体的理解和同情。

1951年下半年，由毛泽东发动、周恩来指导，在全国的大学里展开了一个叫做“知识份子思想改造”的“运动”。周恩来在1951年9月29日作的这场运动的指导性报告，标题就叫“关于知识份子的改造问题”。毛泽东在1951年10月23日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用了“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这一说法。

确实，作为一个第三人称的词，在描述社会的时候，人们会把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人，把学校里的教授这样的人，叫做“知识份子”。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个社会集团的人不会把自己这个集团称作“知识份子”。把一个社会集团称作“知识份子”，意思上就有把别人排斥为“没有知识”的样子，当大多数社会都把“知识”当成好东西的时候，这个说法却是个很不友好的说法。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可以说，我是一个教师，我是一个工人，但是不会也不能说，我是一个知识份子。在社会中，正常使用的和“工人”“农民”相对应的词应该是“教师”“工程师”“医生”等等。对于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人，称为“学者”也比“知识份子”要合适。

在1952年出版的一本《新名词辞典》（上海春明出版社）说明了“知识份子”一词在当时怎么被使用。这部辞典介绍了当时的“新名词”。而这些新名词无疑能说明建立一个与前不同的社会的时候使用的一套新观念。在这部辞典的“社会部”中有“社会成分”一类。这些“社会成分”是：

劳动人民，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工人，产业工人，农民，知识份子，旧知识份子，工农知识份子，干部，职员，人民勤务员，群众，领袖，社会活动家，积极份子，爱国民主份子，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英雄人物，革命军人，革命家，职业革命家，革命烈士，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手工工人，小手工业者，中农，富裕中农，贫农，雇农，平民，小土地出租者，开明士绅，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者，手工业资本家，小商和小贩，商业资本家和商人，富农，半地主式的富农，反动富农，地主，二地主，破产地主，地主成分的改变，高利贷者，管公堂，反动物物，反革命份子，叛徒，蜕化份子，坐探，工头、工贼，工人贵族，游民，二流子，狗腿子，恶霸。

这就是新当权者对社会组成的划分，也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依据。通过这部《新名词辞典》可以了解到“知识份子”在1949年以后被用来指一种“社会成分”，而且，从一开始“知识份子”就被当作一个需要通过“运动”来“改造”的社会成分。把他们划为一个阶级成分，理由就是他们拥有“知识”。这和把拥有土地和工厂来划分地主和资产阶级有类似之处。

后来，在最高当权者们的讲话中，还出现了“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这样的说法。“成堆”这样的说法刚出现的时候，听的人一定是很不习惯的，因为这里已经含有蔑视的成分在内。知识份子被强迫接受批判并且检讨，称作“洗澡”，明显的意思是说他们在精神上肮脏不干净。不过还有更难听的说法是“知识份子”要“脱了裤子割尾巴”。直到现在，人们也好像装作不知道这种说法的侮辱性和下流。在中国出版的书籍中，从来没有人哪怕从语文的角度来批评这种说法。在一个有漫长文学传统和讲究文字的国家，这种麻木令人惊讶。

1952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说：“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让60—70%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12—25%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予过关，只有2%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这样的比例大体上是合适的。”

这个文件明确体现了定好比例数字来整人的做法。应该注意到，这种做法，在人类历史上，在别的地方和别的时间，都是不曾有过的。往前追溯，在1950年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制订了农村杀1%的人，在城市杀0.5%的人的比例（关于这一点，在“顾文选”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按比例杀人的做法，显然足以值得“思想改造运动”的按比例检讨过关变得相对份量轻了。而杀人的威慑力，也足以使得无人敢于反抗后起的“思想改造运动”。

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全国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份子，人人必须“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把过去的思想和学术彻底否定。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须“揭发批判”别人。同时，按照地位高低和是否运动的重点对象，各种人在不同大小的范围和场合当众检讨。

潘光旦的长篇检讨《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曾经发表在报纸上。这份检讨有近万字长，把他的父母、师长、同学、早年所受的学校教育以及他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统统都陈列出来并且逐个加以否定。“检讨”到了这样糟塌一切的程度。据说潘光旦一共“自我检讨”了十二次才获通过。一次一次检讨，不被通过，检讨了十二次以后，才予过关。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哲学教授金岳霖也是清华大学的重点对象之一。金岳霖的长篇检讨题为《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也发表在报纸上。这份“检讨”比潘光旦的更进一步，在批判父母师长和自己之外，把他教过的学生也在其中批判了。除了在学校里由教研室到系到全校范围层层作检讨，一批教授的长篇“自我检讨”被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各省市的报纸上，内容都类似。这些“检讨”中形容词也达到了很高的级度，有“腐败”“反动”“丑陋”等等。通过这样的做法，把“知识份子”向全体人民示了众。

这样的“自我检讨”是怎么写出来的呢？他们是心甘情愿地写了这些吗？笔者已经不可能采访潘光旦本人，也不能获准查阅当时清华大学的档案纪录。200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志》（方惠坚，张思敬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对“思想改造运动”的记载极其简略，只有一个句子。相比而言，《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对这个“运动”的过程还作了一些记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样的检讨是如何作出来的。

像潘光旦和金岳霖是清华大学的重点对象一样，朱光潜和周炳琳是北京大学的重点对象。朱光潜是西语系教授，在香港大学毕业后，到英美留学，1933年开始在北京大学教书，他写的美学著作在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47—448）记载，朱光潜教授1952年3月7日在该系师生大会上检讨，“检讨后，与会者一致表示不满，有5位西语系的教师和学生在会上发言，对朱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揭发和分析批判。”3月29日，北大文学院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对朱光潜教授的检讨进行分析批判”。4月9日，朱光潜在全校大会上作了第三次检讨。4月10日，“全校师生大会对朱光潜教授的检讨提意见，先后有14位教授、讲师、助教和同学发了言。最后，马寅初校长作总结发言。他说朱先生的检讨有进步，但还需要继续反省，加紧改造，根据群众意见，根本改变反动立场，站到人民的一边来”。

显然，朱光潜在此之后，还必须继续检讨，才能过关。这样，运动主持者步步紧逼，检讨者只能步步后退。

周炳琳是北大法学院教授。他在1920年7月和其他4名同学，由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用公费派送到美国留学。周炳琳一再检讨不被通过以后，向马寅初校长表示，他拒绝再作检讨，“愿承担一切后果”。但是他这样说也没有用。他无处可以逃遁。他也不被允许逃遁。马寅初带人到他家里找他谈话，又召开20多人参加的会议“帮助”周炳琳，直到周炳琳表示愿意“清算自己的反动思想”。马寅初也主持北大高层领导人会议商议如何解决周炳琳的问题。（《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49）当时马寅初气势汹汹，全然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自己的位置会倒转。

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北京市市长彭真：“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对份子以外，像周炳琳这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做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做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49）从毛泽东的信可以看出，毛是如何详细具体指导下面的行动的。毛泽东对“政治运动”给予这一类细节性的指导，到他晚年在文革中也仍然如此。

毛说到的张东荪是燕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张东荪他在文革中被逮捕并且死在专门关押特种犯人的北京“秦城”监狱中。

结果，周炳琳教授在4月22日又在全校大会上检讨。“周检查后，有14位教授、助教和同学发言，对他进行帮助。”（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49）非常清楚，除了彻底投降和屈服，他别无选择。

在经历过文革的人看来，这样的开大会批判的方式，已经开始了文革的一套。所不同的是，那时还声称是为了“帮助”这些人，而不是和文革一样公然声称要把人“批倒批臭”。在方法上，那时候对这些“知识份子”，没有动手打，也没有使用肉体刑罚。他们被要求的是用各种难听的词语彻底否定和咒骂他们自己。

1952年5月6日，北大校长马寅初召开会议，称“思想改造运动”已基本完成，于是，“会议决定，5月14日全校恢复上课，今后要做到运动和上课两不误。”（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50）

原来，文革中学校停课搞运动这一套，也是在1952年就开始了。只是文革中大学停了5到6年的课，远比1952年停课的时间长，实际上也是长得大大超过世界纪录和历史纪录。

除了无休止的检讨，还发生了相当数量的死亡。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记载，在1952年3月到5月，北京大学有7个人自杀身亡。在“运动”中被整肃而自杀也不是文革才有的，只是在文革中，自杀的人数更多——北京大学文革的“非正常死亡”有71人。

“思想改造运动”结束两个星期之后，一个新的运动，名叫“忠诚老实运动”，又开始了。这个“运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

据记载，5月24日，在北大高层领导人的会议上“传达了北京市节委会对开展忠诚老实运动的意见”，上面决定的运动方式是：“运动分准备阶段和开展阶段。准备阶段主要是干部学习，放下包袱。开展阶段共分四步：大会动员，小组会上交代问题（也可斟酌用其他更合适的方式），各级领导对所交代的问题进行审查和向本人作结论，总结收获，号召检举。组织形式为按不同类型人员分若干基层，基层下设小组，每个小组约20人左右。”（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51）

“节委会”是一个很奇特的名字和机构，其全名是“节约管理委员会”，从记载来看，当时有“中央节委会”“北京市节委会”和“北大节委会”。但是这个“节委会”的功能却不是仅仅关于一般意义上的“节约管理”的。这个委员会甚至可以举行“公判大会”判人死刑，也设计和领导重大“政治运动”。以上面所说的方式进行“忠诚老实运动”，既然是北京市“节委会”的决定，潘光旦所在的清华大学地属北京，也一定如法炮制，不会有大的区别。

北京大学从1952年5月31日开始全校再次停课进行“忠诚老实运动”。清华大学的中共党委书记袁永熙到北大当工作组长，领导运动。6月2日，袁永熙报告全校忠诚老实运动开展情况：运动发展正常，一天半的时间内有2865人交代问题。6月3日，召开全校典型报告大会。（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51）

这里的所谓“典型大会”，是指让那些被认为“交代”得“好”的人到大会上讲话，这样作不但鼓励了人们“交代问题”，也还可以同时针对那些被认为“交代”得“不好”的人

施加压力。这是一种推行“运动”的做法。1952年3月21日，在北京大学的“教师思想改造学习全校典型报告大会”上，作了“典型报告”的人中，有傅鹰教授，他是化学教授，曾经在国外留学。这种“典型大会”的方式，在文革中，进而演变为所谓“宽严典型大会”，对所谓“交代”得“好”的人“从宽处理”，对“交代”得“不好”的人“从严处理”。关于文革中的“典型大会”，下文将要谈及。

1952年6月8日，袁永熙报告说，全校参加学习的人数是3387人（一部分华侨未参加学习），交代一般问题的758人，交代反动社会关系的1239人，交代一般性政治历史问题的940人，交代重大政治问题的91人，共计3028人交代了各类问题，占参加学习总人数的89.4%；2448人已作结论，占交代问题人数的77.5%；尚有580人未作结论。此外，还交出枪支三件，军刀3把。会议讨论后宣布全校“忠诚老实运动”基本胜利完成。6月11日，袁永熙又报告在这个运动中有41个有“重大问题”的人，其中有教员25人，学生9人，职工7人。（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51—452）

这就是北大停课一周搞“运动”的“成果”！在那时人们“交代”了的问题，个人历史，家庭北京，社会关系等等，以及上级作的“结论”，都被放进了个人“档案袋”。这是新建立起来的社会控制系统：每个人有“档案”，而档案袋子里有什么本人不能看。

这种普遍命令人“交代问题”的做法，从此就形成了一个理所当然人人必须执行的东西，变成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长牢了的部分，再不脱落，并且在文革中越加发展。“×××不老实交代，就叫他灭亡”是文革中常常喊的口号之一。以致听众最多只会想想是否那个人真有“问题”，而不知道这样命令人“交代”本身的不合法性。有被访者说，如果不是看到美国法律有让人保持沉默以避免“自陷于罪”的规定，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中国人把“交代”当作了生活中像天气一样固有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也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搞运动的方式，一个是每个教师都必须检讨交代的做法，一个是编成小组互相揭发的做法，使得这种运动十分严密。在这样的运动中，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另外，每个人除了“交代”自己的“问题”，还需要揭发别人，使得每个人必须和别的同事结下怨恨。从发动和领导“运动”的人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是非常有力的设计和安排。同时，运动领导者也从来不考虑任何时间和人力方面的成本。他们派专门的“工作组”，让学校停课，来进行这一套。如此不惜人力物力，如此设计严密，当然这些“运动”能取得相当大的“成果”。这样一套方式，在文革中也都再次运用，只是规模更大，时间更长，造成的灾难也更大。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上面所引述的，还只是领导“思想改造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的当权的一方所留下的部分记录。尽管这些记录本身，已经是够荒谬够凶狠了，这些记录仍然只是单方面的说法。当时发生的许多事实，并没有被记载和报告，就象如果阅读官方写下的文革历史，我们会找不到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上记载的关于受难者的大量事实一样。

当笔者调查文革历史的时候，有数位被访者说到，早在“思想改造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中，一些人被逼得自杀。在上海，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教授刘大杰多次检讨不能通过，跳黄浦江自杀。由于偶然的原因，他被从江水里捞起来没有死，但是他还得继续检讨。除了老账，还要检讨自己投江自杀的“错误”。还有更可怕的事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平心，生于1907年，江西南昌人，他用斧子砍自己的头自杀。他没有死。但是，虽然他在1952年自杀未死，文革开始不久，1966年6月15日，李平心教授在

家中开煤气自杀身亡。自杀的直接原因，显然是1966年6月10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万人动员大会，李平心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点名攻击。

需要说明，刘大杰和李平心，在1950年代初都已经不是相对来说情绪脆弱容易波动的年轻人，他们是中年人，是发表了相当多著作的冷静的学者，本来是很难会采取自杀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他们并没有反对这两个政治运动。他们是检讨了的，但是检讨通不过。他们已经投降，但是因屈服程度不够而不被准许过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采取了自杀的方式。

还需要说明的是，上文提到的工作组长袁永熙和其妻子陈琏，都曾是大学生运动的领导人物，他们在1930年代后期加入共产党，1949年后成为高级干部。1950年代初是他们这样的人最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年代。他们自以为有要人臣服的权力，也不在乎别人的痛苦，一心运用刚刚到手的巨大权力。袁永熙生于1917年，1952年他35岁。他命令和指挥北京大学三千多教授和学生“交代问题”（他的报告中说是3028人）。想象一下当时校园里的场景，可以知道他当时俨然是一员指挥“政治运动”的骁勇大将。但是，到了1957年，他自己也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划成“右派份子”。他被送到北京郊区昌平区的一个劳改农场五年。1962年5月“摘帽”后，被派到河北省南宫中学，成为教语文和英语的老师。文革开始后，这所中学有5个老师和干部被活活打死或者在被毒打后自杀，他自己曾经被红卫兵打得昏死过去后丢在野地里，侥幸遇救才得以活命。

袁永熙被划成“右派份子”后，他的妻子陈琏和他“划清界限”，与其离婚，得以继续在共产党内担任高级干部。文革中陈琏也因为她的“历史问题”被指控为“叛徒”，遭到批斗。她在1967年11月19日在上海跳楼自杀，死时46岁。

有被访者说，袁永熙和陈琏后来也落入悲惨遭遇，是因为在共产党内，像他们这样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政治运动”中总是容易成为打击对象。他们的下场令人同情。也有被访者说，袁永熙这样的“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整起“知识份子”来可能比别的出身的干部更狠。他们在1950年代初扮演了在学校中迫害人的重要角色。他们迫害人的严重程度其实不因为他们本人的较高的教育程度而减少，甚至还可能因此增加。工人农民没有受过很多教育，却有普通人的常识和对知识的尊敬，而且也没有得到权力整人。这样的人却是一些高度自以为是而又道德虚无为冷酷的人。关于动机的探讨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的目的是陈述事实。在事实方面看，袁永熙的命运沉浮——从整人者变成被整者——确实令人注意。参与设立迫害人的机器的人，不论那人多么聪明能干，仍然可能也被这架机器反身所吞吃。

“忠诚老实运动”一结束，开始了“院系调整”。大学全面改组。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取消。清华大学取消了文理科，变成单纯的工科学校。而且，在所有的大学里，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政治学作为独立的科系也都被取消。潘光旦是社会学教授。在1949年以前，全国大学中有社会学系的有二十个，在校学生975人。（《中国社会学史》，韩明汉，天津人民出版社，页172。）1952年社会学系被取消，取消的理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说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真理，不需要其他的社会科学。苏联的大学里不设置这些科系，中国也照此办理。社会学系直到文革后才逐恢复。

从那时开始中国的教授不再能自己选择学校任职。使得教授必须接受分配的原因之一，是教育界人事制度的改变。学校全部收归政府所有，都在共产党党委的领导之下，教授不可能再自己找工作，既不能去别的学校，也不能改行作别的，而只能“服从国家分配”。也是在1952年，大学毕业生也开始由“国家”“分配”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从几个方面来说潘光旦都不可能再继续他在清华大学的职位和专业了。潘光旦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

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加上“院系调整”之后，对“知识份子”的驯制工程就已经基本实现了。现在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从当权者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三个“运动”设计得严丝合缝，紧紧衔接，互相补充，一环扣一环，所以成效显著。

在一个社会中，控制人的方式主要通过三种途径：1，文化和道德；2，经济和利益；3，强力和恐怖。“思想改造运动”要人人检讨的结果，是在学校里从思想方面彻底否定了这些人。“忠诚老实运动”已经把个人历史上和旧政权的关系牢牢掌握，随时可以找出罪名拿出来整治。“院系调整”则把原来的学校管理体制打碎了，把“（共产）党委负责制”建立起来，同时，把教师们的职业选择也就是从经济方面一把卡住了。

在那时候，还没有像文革那样直接对学校的大批教师施用暴力。但是，与这些“运动”同时或者在较早时进行的别的“运动”，大量对于不设防的人们使用恐怖手段。“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于1951年9月，就在1951年这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枪毙了71万人，把127万人关进监狱，还有23万人被“管制”（《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那时的人们，目睹了不经司法程序的大批杀人，见到了横七竖八堆在卡车上运走的尸体。这类屠杀行为无疑产生极大的威慑力度。

1955年，又进行了“肃清反革命运动”，简称“肃反”。每个单位都有“五人小组”，领导“运动”。所有的教师在1955年的暑假期间，集中住宿一个多月，“交代”自己，“揭发”别人。有一位被访的老教师说，他有时候会夜里说梦话，除了家里人，单位里的同事不会知道这个情况。“肃反”时全体教师集中住宿，很多人睡在一个房间，被别人听到了他的梦话。领导运动的人怀疑他有没有交代的问题，居然叫人晚上不睡觉，悄悄守候在他的床旁边，记录他的梦话，以图收集到他的罪证。

没有经历过这种“政治运动”的人，很难想象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每个人不是变成可怜的被整者，就是充当无情的整人者，不但要声势汹汹“斗争”他人，还要半夜守在同事的床前听梦话，以求发现罪证来整人。这是怎样的一个鬼魅世界。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李季谷教授，曾经留学日本和英国，长期在大学任教，在“肃反”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不戴帽子”。他原是教研室主任，被撤了职。关于李季谷教授在文革中的遭遇和死亡，下文还将介绍。

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赵一炳，193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在抗战时期曾经为在中国帮助抗战的美国人作过翻译，战后又曾经在联合国在上海的办公室作过短暂工作。在“肃反”中他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不予处理”。即使作为一个远离政治的生物学者，他在文革中又遭到“斗争”和关押。

就在1955年11月，北京大学建立了“粮食定量供应评议委员会”，布置全校粮食定量评定（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97）。这是全国性的政策，其他大学也在同时建立这样的机构。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一方面是因为粮食缺乏，另一方面，国家对每一个人的控制，随着粮食定量供应也达到新的高度。不仅在职业方面高度控制，而且在食品方面高度控制。本来，在社会中，一个人还可能有余钱付另一个人的生活费，支持那个人的生活，但是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之后，即使有钱，却不能有粮票来喂食别

人。通过粮票发放，个人更多被束缚于他的单位和居住地户籍管理。想要离开这种束缚，只有饿死。要想生存，必须紧紧靠拢和服从这个制度和权力中心。

托洛茨基曾经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不劳者不得食”这个古老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哈耶克在《走向奴役之路》第九章引用了托洛茨基的这段话）。在1952年的大学里也是一样，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不检讨者不得食”、“不交代者不得食”、“不服从分配者不得食”。在对个人的控制方面，1950年代初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密程度。

1956年一直被当作对“知识份子”最好的一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份子的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对知识份子“要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改善了对知识份子的物质待遇，当然，物质待遇的提高也会引起相应的其他方面待遇的提高。不过，在5月的北京大学的“五四科学讨论会”上，马寅初校长致开幕辞后，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冯友兰的《对过去哲学史工作的自我批判》，另一篇题为《批判冯友兰先生过去的哲学思想》。冯友兰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从论文题目可以看出，没有发生建设性的学术发展，依然是延续了数年之久的调子，“自我批判”和“批判”。

通过上述的个人遭遇，以及在集中领导下“运动”以同一规范在各学校进行的情况，就能理解为什么潘光旦会用两个S，“屈服”和“投降”，来形容他的经历。第三个S是活命，这三个S之间的这种联系，是事实，也更令人震动：只有“屈服”和“投降”，才可能“活命”。要想活命，就必须投降和屈服。实际上，如果一个政权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包括经济和职业的资源，如果由政权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普通人就只有“屈服”和“投降”，没有别的活路，并非只有“知识份子”才如此。

### 3，“戴帽子”的年代：“反右派运动”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潘光旦被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前，就大多数知识份子来说，遭受的是被迫“交代”和“检讨”。“反右派运动”在社会惩戒机制方面造成的一个创造性的变化，是权力当局以言论为罪名，把社会中的一大批人“戴上帽子”，并进行各种惩罚。

文革后中共中央宣布的数字，有55万人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学者丁抒先生在《阳谋》一书中认为有100万人。中共中央当时的政策明确规定，工人农民中间不划“右派份子”，对工人中间有“右派言论”的人，划为“反社会主义份子”。惩罚是同样无理而残酷的，但是使用了不同的名称。因为这样，所以，被划成“右派份子”的这上百万人，基本上就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受过教育的人，所谓“知识份子”。

“右派份子”中，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还有相当部分被送去“劳教”和“劳改”。中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把已经缺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教育工作者抓出很大的一个比例来作为“右派份子”进行迫害，这样作，不但是对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的迫害，也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极大损害。这样的做法是十足的害国主义。

5月15日，毛泽东就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在共产党高级干部中间传阅。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提出要抓“右派”，人数比例可以达百分之十。7月9日，毛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再次讲到教授副教授中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24，441）后来，他果然这样做了，按照这样的比例划定“右派份

子”。在强权压迫之下，没有人能质疑这种把上百万人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并且加以严厉惩罚的做法的非法性。

在北京大学，有714人被划为“右派份子”。在清华大学，有571人被划为“右派份子”。

据说潘光旦在“反右派运动”中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响应号召”“提意见”。当时甚至有人说他是“揭了盖子都不跳”的人。显然，潘光旦经历了这以前的一系列“运动”，已经非常谨慎小心。但是潘光旦在中央民族学院仍然被划为“右派份子”。他的同事吴文藻教授和费孝通教授也被划成“右派份子”。吴和费都是在西方受过训练的社会学学者，由于“院系调整”而来到民族学院。他们先是专业被取消，然后又被一网打尽变成“右派份子”，“人民的敌人”。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9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费孝通反动活动的面面观》提到潘光旦。在“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小标题下，文中说：“整风前夕，社会学界那班旧人马已在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吴文藻等人四出串连之下，在北京碰了头，开了会。6月9日，费孝通、吴景超、吴文藻等人又开了一次关于恢复‘社会学’的会议，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地方的大学恢复社会学系，先从北京上海做起。北京方面，在北京大学设系，由吴文藻担任系主任，另在人民大学设社会学研究室，由吴景超主持。此外，决定在北京、上海两地设立社会学会，先进行社会学人员的登记。他们就这样划定了地盘，安排了位置，只等被篡改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公布’以后，便要袍笏登场。”

看来“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是潘光旦的主要罪状。实际上，社会学系是在文革结束后才在大学里恢复的。

吴文藻的妻子是在“五四时期”出现的著名作家冰心。她进燕京大学读书，后来到美国留学。吴文藻与她在去美国的轮船上相识。冰心在美国留学时写了《给小读者》。她的真诚清丽的文字打动过无数大小读者的心。1957年，冰心的丈夫被划成“右派份子”，她的儿子被划成“右派份子”，她的弟弟也被划成“右派份子”。

笔者访问过一位老教师，她在文革中和冰心一起到过中央民族学院在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她们曾经在一起收过麦子，相当接近。冰心曾经非常难过地告诉她说，他们家人除了她，都被划成‘右派份子’”。冰心的文章，终其一生，总是保持她早年的清雅风格，内容也几乎不触及生活或人性的阴暗面。但这只是她心里的伤痛和烦恼被深深掩饰起来罢了。如果她生前有机会开口谈论，也会说出真实感受如潘光旦的吧。

“右派份子”被分成六类，受到不同等级的惩罚。这种不同等级的惩罚保证惩罚顺利推行，因为人们只好接受处罚，以免被送到地狱的更低一层。为了保自己，一些“右派份子”也揭发别人。《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批知名的“右派份子”的认罪书，还刊载了他们的互相揭发。这种做法有力地分解了“右派份子”，也从道德上彻底摧垮了他们。他们不但遭到降职降薪以至“劳教”“劳改”的处罚，而且失去了体面和荣誉。本来，在社会中，体面和荣誉，是维护道德的方式。

“反右派运动”以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的检讨认罪结束，没有人抗议把人划成“右派份子”这件事本身，更没有人指出这一行动的非法性。这是“知识份子”的又一次屈服和投降。比起前面的“政治运动”，“反右”在迫害人的规模和程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严重的。但是，比起文革，这一次不算最可悲。因为这一次，就算是上了“阳谋”的当，多多少

少，他们还说出了自己的一点点看法。以后，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文革中被迫害的人们，都不是因为他们对“革命”有所非议，而是革命主动出击收拾了他们。

“反右”以后，“知识份子”的地位变坏了一大步。北京大学的化学教授傅鹰，上文提及，在1952年曾经被当作“思想改造”的模范，还在北大的大会上作为先进典型发言。在1957年，他被定为“中右”份子。意思是以他为标准，比他“右”的人就都划为“右派份子”。到了文革，他遭到“斗争”并且在北大被关押监禁及“劳改”。傅鹰教授的例子很是典型。从他的例子可以看到，因为一批一批的人被一个一个“运动”打垮，存活者的位置也一步步滑向右边的“阶级敌人”位置，离灭亡不远了。

“反右派运动”之后，1958年开始了“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那些没有被划成“右派份子”的知识份子作了什么呢？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的导弹专家钱学森，发表文章说：“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钱学森后来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再次以“中国力学学会会长”名义发表同样的意见，说粮食亩产可以达到3·9万斤，作物生长密集，可由流体力学解决通风问题。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13万斤，比钱学森的设想又加了两倍多，不过倒也还遵循了钱学森的计算，没有高出一亩地上能得到的太阳能的总数。

钱学森的文章今天读来像是个笑话。但是放在历史的背景上看，没有人能笑得出来。多年以来，钱学森因为参与军事工业，他受到的待遇一直比其他知识份子要好得多。但是在这样的文章里，能看到的也就是科学向强权投降，常识向邪说屈服。

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主张在中国节制人口的主张，也在那时遭到激烈攻击。马寅初，1882—1982，1906年到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1914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经任大学教授和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马在1940年代在公开演讲中严厉攻击过蒋介石政府，遭短期监禁，因此被称赞为反蒋英雄，他在1950年被新政权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科学教育出版社，北京，1983，页48）说，1951年9月开始的“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是由马寅初在北大教员中发起的。由毛泽东周恩来发起的运动，恐怕不能归给马寅初。但是他在那时候确实表现非常配合也非常积极。上文写到了1952年他如何给朱光潜和周炳琳教授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多番检讨。1955年7月，他主持召开行政工作会议，讨论在北大进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份子的问题”，即那一年全国性“肃反运动”。从1950年以来，马一直是一系列“运动”的“动力”而非“对象”。但是，很快他也堕入了他组织批判过的教授们的处境。

1958年，他遭到中共高层领导人组织的围攻。中共党报发表文章攻击马寅初的理论，北京大学也贴出了大量大字报攻击马寅初，连他的住宅北京大学燕南园36号也贴满了大字报。马曾经说过中国人教育程度低，缺乏文艺生活，生孩子太多。这样的事实描述被挑拨性地指控为“诬蔑劳动人民”。1960年3月31日，教育部长杨秀峰到北大传达了国

务院3月28日会议决定：接受马寅初校长辞职的要求，同时任命当时的北大中共党委书记陆平为北大校长。在马去职之后，中国的大学校长由教授学者来当的时代就结束了。

马寅初搬出北大，政府给了他北京东城区的东总布胡同的一座住宅。那个胡同里有一些旧时代留下的大住宅。马寅初的房子很大。曾经有进入马寅初家的人说，“马家大极了，房间一个接一个，走来走去，好象进了迷宫。”（《世界日报》2001年8月1日，D15，“二伯也住东总布胡同”，作者沈宁）。“迷宫”一说，可能只是这位当时全家只有两间小屋住的目击者的主观感觉。马寅初的房子也许没有大到这种程度，但是和当时其他北京学者和普通百姓的拥挤简陋的住房条件的巨大差异，应该是事实。

马寅初活到了文革之后，并且看到他的人口理论的胜利。在他得到平反之前，他没有作过四十年代他作过的对那时的当政者的那样言辞激烈的抗议。文革中他遭到红卫兵的抄家和毒打，据说他以气功调节身体，忍耐了红卫兵的折磨而活下来。他的性格大概不会和从前有太大不同，但是他忍耐而没有抗议，应该是由于他了解时代和他从前在国民党政府时代被捕的那次不一样了。现实的情况是，如果他说什么抗议的话，没有一家媒体会加以报道；如果他被捕进监狱，他会像1955年被捕的胡风那样，被判处长期徒刑，从社会中完全失踪，或者甚至被红卫兵当众打死。不会有别人站出来替他说话，更不可能被大众认为是“英雄”。

和趋炎附势投机转向的人相比，马寅初的忍耐和沉默可以被看作一种反抗，但是，他毕竟闭上了嘴巴，没有继续再说任何批评的话。闭嘴也是一种屈服。有人说，他反对过国民党政府，那未必是因为他勇敢，而主要是因为那个政府不那么残忍或者当时不可能作到那么残忍。没有人反抗的时代，是比有人反抗的时代残酷的。

这个说法看似严厉批评了马寅初这样的人，但是其实也可以当作为他的辩护，因为不然就反倒令人怀疑他的贯穿一生的原则是什么以及有无原则的问题。是空前的残忍阻挡了他作第二次反对强权的行动，而不是他因为得以住进了一所大住宅就轻易放弃了反抗的权利和力量。

粮食亩产量，人口增长数字，从“知识”的角度说，这些都是能算得清清楚楚的东西。之所以亩产可以万斤，节制生育不准实行，这不但是“知识份子”的投降和屈服，也是“知识”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当用数字可以算清的“硬碰硬”的真理都被断然否决，其他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就更无立足之地了。潘光旦是著述丰富的人。1922年，他写了关于中国女性的自恋的心理分析的书《冯小青》。这本书是中国学者用弗洛伊德理论来研究中国人心理和传统文学的开始。这本书很薄，但是相当富于创意。后来他研究“优生学”，翻译注释过《性心理学》。他的这些研究全部被否定。其实，这些研究虽然不能马上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但是显然能帮助中国人提高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

成为“右派份子”，潘光旦不能再写作和发表。当时有明确“规定”，“戴帽子”的“右派份子”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出版物的作者名字中，连数学书都如此，更不要说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出版物了。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的数学教授马明强，被划成“右派份子”后，他用别人的名字，发表了他写的数学书。潘光旦不能发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于是开始作翻译。他的英文和中文修养都非常好。他开始翻译达尔文的一部经典巨著，“THE DESCENT OF MAN”。他的女婿胡寿文帮助他一起翻译。这部大型译作在文革开始前，已经基本完工。

1958年之后，发生了大饥荒。那些被送去“劳动教养”的“右派份子”们，高强度劳动加上饥寒交迫，相当多的人在劳改营里失去了健康甚至生命。潘光旦算是幸运，还留在学院里，没有被送到北大荒劳动。他的两个女儿在北京大学工作，也算是有些特权的人物。潘光旦的一个女儿在1958年生头胎孩子。产妇需要吃鸡蛋，国营商店没有鸡蛋。他的女婿在海淀从一个农民手里买到一小篮鸡蛋，还没有回到家，鸡蛋就被“执法人员”没收了，因为北京不允许有“自由市场”，不许农民出售他们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这样，产妇要吃鸡蛋成为非法。

到1960年，饥饿越来越严重。大学里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而得了浮肿病，学校不得不停止体育课，让学生下课以后就到宿舍躺下以节省热量。农民是粮食的生产者，在那时却成批饿死。年年增长的中国人口，这时候出现了负增长。数千万人被饿死了。当马寅初被批判的时候，曾经被指责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尔萨斯一样。马尔萨斯是英国学者。在他的时代，避孕药和器具还未得到发展。马尔萨斯的书里写到，人类的人口增长总是超过生产增长，无法控制，只是有时候饥荒和战争，减少了人口。当时为了批判马寅初节制人口的主张，也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就把他对历史的这一描述，歪曲成了他主张用战争和饥荒来减少人口。实际上，非常讽刺性的也是非常悲剧性的是，在中国，在1950年代的人口增长之后，就发生了饥荒带来的大量的人口减少，像马尔萨斯描述的一样。

食物分配成为大的问题。“上面”定出了政策，级别高的教师，可以享受每月特别供应黄豆若干等等。在广东，1961年10月，中共中南局领导人陶铸指示制定一个副教授以上级别的2,000人名单，每月补助食油一斤，粮食10斤；从2,000人中再选出200人，与厅局级干部同等待遇。（转引自《陈寅恪的最后20年》，页342，北京三联书店，1995）那时候“知识份子”似乎又得到了“尊重”。他们没有抱怨这种“尊重”。也许饥饿使人不再去想，为什么吃一点黄豆或者一斤油也要成为一种特别的恩赐。饥饿以及对于食品的这种控制，造成了对人的越来越严密的控制，也进一步窒息了学术思想的敏锐和活动性。

潘光旦的“右派份子帽子”在1959年12月被“摘”去。“摘帽”有规定的流程。领导先通知本人，说你认错改造有进步，考虑给你摘帽。然后这个人要写一份详细的思想总结，再次详细检讨认错，并且对“党和人民”的“宽大”表示感激，然后，当局准予“摘帽”。这是必须的流程，否则不能从那张整人机器的巨口中被暂时吐出。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潘光旦一定得如是作。他的难能可贵之处是他一直清醒地知道自己是在投降和屈服，而且最后有勇气承认和说出。他没有自欺欺人。

（未完待续）

□ 原载《爱思想》网站

~~~~~

【难忘岁月】

复旦往事（选载之十）

• 吴中杰 •

（上接1911b）

## ▲ 隔离室里修炼

严冬早已过去，春寒亦已消退，时序已由暮春转入初夏。透过窗子上层那块没有涂漆的玻璃，可以看见外面的蓝天、白云和明媚的阳光。公园里应是红花绿叶，田野上大概一片油菜花黄吧，但是我却还被关在隔离室里，继续做六面碰壁居士。

看来，运动已近尾声。一个个小集团依次开过批斗会，现在已经无可再批，高音喇叭里的“一打三反”专题节目也日渐稀少，隔离室已陆续放人，“态度好的”是公开宣布撤销隔离，意在“宣传政策”，还有些人则是悄悄地放，大概这些人实在整不出什么名堂，榨不出什么材料，关的时间愈长愈难向当事人和群众交代，所以还是早放为是。

什么时候能放我呢？

当初那样虚张声势，把我渲染成策划于幕后的反革命头目，现在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找不到足以定罪的材料，看你们怎么收场吧！

当然，要他们认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永远是正确的。

过去，即使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时代，也还有平冤狱一说。既然承认是冤狱，当然肯定是错案，需要平反，宣布挨整者无罪。但我们早在五十年代就批判过“平冤狱”的说法，认为这是右派言论。既然没有冤狱，当然无需平反，整人者也就没有错误。整人者既然永远正确，那么错误就始终属于挨整的一方。整出材料来，自然要定罪，定不了罪的就叫“落实政策，从宽处理”。并非你没有罪，而是我对你宽大为怀。这样，整人者不但不必认错，而且挨整者还得感谢皇恩浩荡。有些人结案时千谢万谢，感谢工宣队的挽救之恩，表示永不翻案，就是演的这出戏。其实，只要你定案材料充分，就不怕别人翻案；要人家表示永不翻案，正说明定案者心虚，自知材料不可靠。

那么，他们对我将作如何处理呢？我扮演长胡子角色的任务已经完成，会不会悄悄地放掉我呢？我等待着。

这样，又等待了好多天，但他们仍毫无放我出去的意思。

隔离室进行了调整。大概别处的隔离室都已撤销，有些人放出去了，只有这些要犯不能放，所以一个个都集中到十号楼里来。给我换了一个房间，我的隔壁关进了周谷声，斜对面是王志惠，在走廊里打饭时还见到邱励欧；胡守钧则仍关在走廊尽头那个房间，房门口另有民兵加岗把守。看来，我们这几个人要长期关下去了。

我虽然已经历了许多事情，也长了不少见识，但还是太天真了。他们即使搞不出足以定我罪名的材料，但怎么能轻易地放掉我呢？我与那些被悄悄地关进来，又被悄悄地放出去的人不同。对他们的事好交代，就说问题搞清了，现在是落实政策，而对我这个大张旗鼓地整过的要犯，现在却搞不出材料，一放了之，他们怎么下得来台呢？

中国人的面子最重要，为了面子，是可以不顾实际情况而蛮干下去的。看来，我得为他们糊面子而继续关下去。

专案组已不大来找我了。他们开始是每天到隔离室来几次，后来是几天来一次，再后来是一个星期一次，现在是好几个星期不来了。他们不来找我，可以让我清静一些，这当然使

我高兴。但是，他们连工资也不送来，却使我有断餐之虞。我虽被隔离审查，但未定罪判刑，工资还是照发的。每个月六号都由专案组代我领来，我填好汇款单，再请专案组代寄一些钱给我母亲、女儿，剩下来的作为伙食费。但这个月已经快到月底了，还不见专案组将工资送来。我写了张纸条，请看守民兵转给专案组，催他们代领工资。第二天刘家国来了，故意问我，找他来是不是要交代问题？我说没有钱买饭菜票了，请他将我的工资领来。他不但带工资来，却将我训了一顿，说我如再不好好交代问题，休想要工资。说罢，拂袖而去。

这话很耐人寻味。他们以前操着必胜的信心，盛气凌人地逼供时，装得很讲政策，说生活上决不苛待我，现在却撕下了假面，连工资也不发了。这出于何种心理呢？只能说明他们黔驴技穷，已经对我无可奈何了，才会出此下策。如果他们还有进攻的信心，那是决不会如此耍无赖的。

看透了专案组的心态，我就更加笃定了。你不送工资来，我也不再找你。想用不发工资的手段来吓倒我，要我屈服，那简直是小儿科的做法。

又过了几天，我的饭菜票眼看要用完了，而专案组还不送工资来。怎么办呢？我不能再写条子去催，再催就是示弱，而不催，就得挨饿。这也许是专案组给我出的难题，我得设法解决。

我想到了利用矛盾的办法。

在隔离室大调整之后，看守的民兵也调换了。大概因为运动的禁止已过，整个政治气氛已经松下来，第二批看守民兵已不像第一批民兵那样的一副凶煞神似的面孔，他们不但态度和善得多了，而且有时还开门进来聊几句天。有一次，一位民兵带着神秘的笑容问我：“你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当时不好直接回答他，只好也神秘地笑笑。但可见他们对我是同情的，我要利用这点来争取生存的权利。

我敲敲门，请看守民兵进来。

“我的饭菜票要用完了，只够今天吃的，明天就没有了。但我这个月的工资，专案组到今天还不送来。不送工资来，我就没有钱买饭菜票。我不想绝食，我想你们也不会赞成我绝食。这件事请你们帮忙解决。”我平静地申诉道。

“当然不能绝食。绝食不符合党的政策。你为什么催一催专案组？”看守民兵问。

“我催过专案组，他们说我不交代问题就休想要工资。但我实在没有什么问题好交代的了。”

“交代问题与发工资是两桩事，他们这样做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这件事由我们去联系好了。”看守民兵对专案组办事颇不以为然，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果然，第二天刘家国就来了，虽然悻然的面色极其难看，但把我的工资带来了。而且，以后每个月也不再扣留我的工资了。

这一回合的胜利，给我带来更多的安静。我知道我是不会很快放出去了，专案组也知道我不会由他们摆布，大家就这样僵持着。

安静的时间长了，我就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无聊。



以前处于正常的生活条件下，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上课、读书、写作、开会、劳动，还有家务活等等，把每天的时间都排满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虽然不用上课，也不能写作了，但总还想读点书，这就得见缝插针，每天仍很紧张。关进隔离室的初期，正常生活中的一切，当然都谈不上了，但为要应付逼供、批斗，也无暇顾及及其他。现在，突然如此空闲起来，却又不知日子该如何打发了。

我很想读书。倒不是还想有所作为，而纯粹是一种习惯、爱好。读书人没有书读就像瘾君子没有烟抽一样难受。身边只有四卷《毛泽东选集》，这是早已读过几遍的了。原来还带有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进隔离室时都被收去了。说是审查对象只能读《毛泽东选集》，不能看其他书。你们不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吗？为什么连老祖宗的书都不准读呢？真是莫名其妙！当然，这也是不能反问的，一问，就是一条严重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罪状。

那么，就读《毛泽东选集》吧。

隔离在学生宿舍时，工宣队指定我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但我觉得这根本是两码子事，所以读完之后无所感动，接着随手翻到另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正在阅读之时，被袁瑞云看到了，他加以训斥道：“你是要将反革命进行到底吗？真是顽固透顶！”我听了大吃一惊，真想顶上一句：“你们口口声声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却将‘毛著’如此地歪曲，真是反动透顶！”但我知道，这不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性法庭，而是封建式的升堂问罪，县官大老爷说什么都对，罪民是不能顶嘴的，否则就是咆哮公堂，罪加一等。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一笑了之。

现在可以随便读《毛泽东选集》了，这也是一种自由吧。为了充分享受这种自由，我决定从头到尾通读。其实也是为了消磨时间，我不但逐字逐句读正文，而且连注释都很仔细地看过。这样，不知不觉地通读了好几遍。

读书不但可以消磨时间，而且入定之后，对周围的环境也有点莫知莫觉，可以减少许多痛苦。

天气渐渐地热起来了，门窗紧闭的隔离室真是闷得难受。但我明白，这是在打持久战，工宣队正是要使我们烦躁得忍耐不住，向他们举手投降。我要镇静，不能烦躁。我想起了“心定自然凉”这句话，要将心镇定下来。读书是最好的收心方法，只要有文字的东西，我就当宝贝似的抓住不放，至于内容倒无关紧要的了。有一回，好心的看守借我一张《解放日报》，我一字不漏地看了一整天。不但读社论、阅消息、看文章，而且连边边缝缝都一条条地看过去。我简直成了果戈理笔下的彼得尔希加，这位乞乞科夫的跟丁，每到达一地，主人在谈判购买死魂灵时，他就躺在蛋饼似的棉被上读书，他并不懂得书的内容是怎样，但什么书都读，无论是爱情故事还是小学课本，是祷告书还是化学教科书，他都一样地读得很起劲。现在我也不管报上的消息和文章说些什么，只要有连贯的句子让我读就可以了。这时我才体会到，将知识份子关着，不给他书看，让他在时间上处于真空状态，这是一种巨大的折磨，甚至比批斗和劳动改造还要使人难受。有些人被关得发了疯，大约就是这种状态造成的吧！记得茨威格有一篇小说，写一个犯人在监狱里于无意中得到一本棋谱，简直如获至宝，津津有味地读得滥熟，后来成为棋王，而每一下棋，又感到非常痛苦。此中心境，我到此时才能体会。

关闭的房间闷得有人中暑了，他们不得不将门窗打开。空气流通之后，当然凉爽得多了。而且别的房间的响动也听得很清楚。王志惠在直着嗓子唱样板戏，周谷声在低声哼抒情歌曲，虽然有时受到看守民兵的喝止，但过一会又唱起来了。从看守与王志惠的对话中，我

知道王志惠把毛衣拆掉，重新在编织。大概也实在是闲得无聊了吧，使得这位莽张飞干起女工细活来了。我不能不佩服王志惠会动脑筋。他是什么办法都想得出来，什么事都能干得了的。我也受到了启发，该找些事做做，来料理料理自己的生活。把毛衣拆掉重打的勇气是没有的，拆掉容易编织难，我从来没打过毛衣，要是拆掉打不起来，天冷了穿什么？我会洗衣服，还是把衣被都洗洗吧。

天热了，洗衣被是合理的要求，看守民兵答应了。

我洗了单衣刷棉袄，刷了棉袄洗被单，最后还把一条厚军毯也洗得清清爽爽。这条呢军毯是我父亲打日本人时得到的战利品，我读高中之后就归我所用，因为又厚又重，所以20年来从没洗过。这次整整花了一个上午时间，不知换了多少遍水，才将它洗得干干净净。虽然洗得很吃力，但心情很愉快，手里做着点事，总算能解解厌气。

不过，洗了几天之后，我的衣被都洗干净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洗下去，每天仍闷居于斗室之内。

《毛泽东选集》已通读过几遍，没有兴趣再读了。但不读又无事可做。有时就坐在窗前呆望，这间房子的窗外是另一条小道，但很少有人来往，小道边就是围墙了，视野并不开阔。但越过围墙顶上，则可以远眺对面轻工业学校的宿舍，可以看到那边楼上住家的日常生活：烧饭、洗衣、晒被……这是极普通的生活细事，每户人家都有，在平时是决不会去注意它的，但此时看了却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这就是生活！我羡慕这种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但是我出不去，我不能过这种生活。我还要被关到什么时候呢？

有时，我在房间里踱方步。房内是熟悉的床、桌子、板凳和墙，实在没有什么可注意的东西。但突然，我发现了新大陆。在墙角的地板上，有一队蚂蚁在奔忙，它们从一条地板缝里钻出来，奔入另一条地板缝中，匆匆忙忙，不休不停，无暇他顾，就像那些为谋生而奔忙的人们一样。我记得在幼年时曾观察过蚂蚁打架或搬运食物，上学之后就被书本所累，无暇再与蚂蚁为伴了，不意现在三十几岁的人了，重新再来看蚂蚁搬物，而且还看得津津有味，有时还留几粒米饭来喂蚂蚁，看它们拖着比自己身体还大的饭粒走动，也是一种乐趣。

不过，仰看窗外和俯察地面总不能打发终日，我还得找点事做。

我想起了写《鲁迅传》。

在中国的作家中，我最喜爱鲁迅。他思想敏锐，言辞锋利，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对中国问题看得深，说得透；他剖析的是过去的社会，但对认识现实生活仍有很大的帮助。读鲁迅的作品，能够使人聪明起来，对社会人生有进一步的理解。我很想写一本《鲁迅传》，把这种认识介绍给读者。在运动初期，我曾悄悄地准备资料，并且已经写成好几章了。现在既然闲得无聊，何不继续写下去呢！隔离室里没有书籍，也不备稿纸（写交代材料的纸张是清点过页数的），要照常规白纸黑字地写起来，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何妨写在大脑皮层上呢？好在资料是熟悉的，这样我就开始了“写书”的工作。

表面上看起来，我跟前些日子一样：看《毛泽东选集》，踱方步，抬头向窗外呆望，低头托着腮沉思，但实际上，我已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集中精力在构思《鲁迅传》。先安排章节和段落大意，后思考文句的表达。我身边还保存有一本小笔记簿，那是搜查时的漏网之鱼，现在正可以用来记下章节大纲。详情细节虽然写不下，但经过了反复的思考，又有这些大纲可以唤起记忆，以后凭此就可以衍化为文字了。

精神上有所寄托，脑子里忙着构思，就不觉得日子难过了。后来，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出版社约我写作《鲁迅传》，我就是根据这个小本子上的提纲，很快地整理出来的。只是出版社要将它列入“文艺知识丛书”，限定写10万字，虽然我写了13万字，还是突破了限制，但毕竟篇幅太小，不能畅所欲言，只好名之曰《鲁迅传略》，待有机会再扩写成《鲁迅传》。不料后来教学繁忙，杂事渐多，这一搁就搁了20多年，搁得自己都准备放弃了，直到近年退休之后，才想着要重理旧业，还此心愿。不过，这本已出的《鲁迅传略》虽然与我原来的意图相差甚远，但毕竟是隔离室中艰难时日的纪念，是力图挽救自己精神免于崩溃的产物，因此我仍很喜欢它。

这种时日一直持续到秋天的来临。天气渐渐地凉爽，日子也比较地好打熬了。9月份的某一天，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我突然听到《人民日报》——也许是《红旗》杂志，发表的一篇社论，是批判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在追溯这个骗子的历史时，还提到了《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这篇文章，以揭示他打着调和折中的旗号来偏袒“国防文学”口号的老底。我研究过现代文学，清楚地记得《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这篇文章是陈伯达写的，而陈伯达则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在“文革”中是个一手遮天的人物，怎么“文化大革命”会革到这位组长头上呢？于是在此后几天内，我留心听新闻广播节目，仔细琢磨新闻、评论在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言外之意。本来，只有文艺作品才讲究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旨的，评论文章和新闻报道则以直接明了见长。但“文化大革命”以来，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又有全点名、半点名、不点名等种种讲究，当权者在某些问题上想有所指示，但又不愿或不便直接说出，于是文章和报道就写得曲里拐弯，要读者自己去领会、猜测。好在我们本来就是文字游戏的国家，所以大家也在字谜中讨生活。但有时也有些人因为猜错了谜底而大吃苦头。

因为点了《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这篇文章，陈伯达出了问题无疑是无疑的。但到底是什么问题，却还捉摸不透。《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这篇文章发表于1936年，解放后被收集在好几本文学运动史料中，本不是什么秘密，但对于陈伯达这样的大人物，决不会因三十多年前这么一篇文章而大动干戈的。鲁迅说过，发思古之幽情，总是为了现在。那么，陈伯达出了什么问题呢？但我更关心的是，这场新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对我们这个案子的处理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很清楚，对我们这个案子的处理，是直接取决于张春桥的政治地位的。我希望张春桥牵涉进陈伯达的案子中去，这样我们就可以解放了。但看看又不像，新闻中还不断报道张春桥的出场，说明他一时还不会倒台。如果第二次炮打事件的确与陈伯达有关，那么，陈伯达的倒台也许反而会加强张春桥的力量，这就对我们更不利了。但一时间也都看不出究竟来。

陈伯达事件对于我们隔离室生活的直接影响，是允许阅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了。报纸、广播中在批判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的同时，不断宣传，要大家认真读几本马列原著，以便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我抓住这个机会，要求让我读马列原著，终于获得同意。我要回了被收去的马克思著作，又托看守民兵买了几本，就认真地阅读起来。

真是开卷有益，认真读这些书的确有助于提高认识。然而，对现实政治却更加怀疑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而现实政治中有许多讲法和做法恰恰与此相反，这怎能不使人怀疑呢？

比如，马克思说过：“如爱尔兰维修所说的那样，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1848年—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对于这一观点有过更详尽地发挥：“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

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一情况完全是种偶然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替代他，并且这个替代是会出现的，——也许是较好些或较差些，但经过一些时间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那被战争弄得疲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性。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充当的。这点可由如下一点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一个人：恺撒、奥古斯特、克伦威尔等等就是如此。如果说唯物史观是由马克思把它发现了，那末梯也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等，便是证明有许多人都已在力求达到这一点，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就是表明做到这一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而这一发现必定要被作出来的了。”（《致亨·施塔尔肯堡》）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很明确：是时势造英雄，并非英雄造时势；是时代创造思想，并非思想创造时代。印证历史，这种理论的确符合事实。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彻底的，他们在阐述理论观点时，并不把自己当作例外处理，你看，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对于唯物史观的发现时，既没有脱离时代条件，也不抹杀别人的功绩。而我们那些理论家和权力者们呢？

又如，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人类历史或我们自身的精神活动时，在我们面前首先呈现的是种种联系和交互作用的无限错综的图画，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们知道，这些对立仅有相对的意义：凡今天被承认是真理的东西，都有现时隐蔽着而过些时候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凡现在被承认是谬误的东西，也都有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做真理；那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种种纯粹的偶然所构成的，而被认为是偶然的的东西，则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的，世界是一个历史过程，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之中。可是林彪却将毛泽东思想鼓吹成顶峰，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一切都要按毛主席的话去办，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去执行。这哪里有一点辩证法的成分？怪不得他们不但将历史上的一切思想家全否定光，而且连马克思的书都不准读。他们的言行是与马克思背道而驰的。

更令我震惊的是恩格斯对于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个原理的分析：“黑格尔的这一原理，在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时，意思只是说：这个国家在它是必然的这个限度内，才是合理的，才是符合于理性的。如果说，在我们看来，它终究是不中用的，而且尽管不中用，仍旧继续存在，那末，政府的不中用，就可用臣民那相应的不中用来辩护和说明。当时的普鲁士人有着他们所应该有的政府。”（《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岂不是说，中国目前这场劫难，正是不中用的臣民所应该有的。这话虽然尖刻，但细想起来，却也很有道理。当“文化大革命”起来时，虽然人人自危，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一个个被拉下马来，但有谁曾用手中的权力表示过抗争呢？他们抱着侥幸之心，想到的只是自己如何保住乌纱帽。而在全国老百姓中，救世主思想、权力崇拜现象不是普遍地存在吗？这样，顶峰论和个人崇拜才有市场啊？

这几本书我过去也曾读过，为什么对这些话竟没有注意，有些话虽然在学理上也研究过，但却没有联系现实作思考。可见我自己就不是一个独立思考者。大抵人总需经过一些磨难，才能变得聪明一些。

在读了那几本书之后，我对前途颇为乐观。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看，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变的，事情做过了头总会走向反面，目前这种混乱局面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纵看历史，在历史的长途中大家都是来去匆匆的过客；俯察

人生，在人生舞台上，每个人都是演员，是非功过，时间会作出最公正的评价，自吹自擂是无济于事的。我不能气馁，头顶上的乌云终会散去的，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我每天仔细听新闻联播节目，密切注意形势的变化。但是除了连篇累牍地不点名批判陈伯达之外，别的也听不出什么名堂。我们的案子仍旧拖着，除了王志惠常常与看守和专案组争吵之外，隔离室相当的安静，大家都磨出性子来了。

天气渐渐转凉，我由赤膊而穿汗背心而加衬衫，别人也大抵如此。独有王志惠仍旧赤着膊而高唱道：“朔风吹，林涛吼……”颇有滑稽之感。有时在走廊或厕所里碰到，他就给我做做鬼脸，这是在隔离室中所能给我的心灵慰藉。有一天，又听到王志惠与专案组的争吵声了，而且愈吵愈激烈。仔细听听，原来是专案组说天冷了不准赤膊，要王志惠穿衣服。而王志惠说赤膊是他的自由，他要到寒露以后才穿衣服。正在争吵间，一名工宣队员突然插话道，寒露是10月10日，你要到那时穿衣服是想庆祝国民党的双十节，你反动透顶，云云。这顶帽子实在扣得莫名其妙，王志惠当然不买账，与他骂起来。不几天，工宣队带了公安局的人来把王志惠带走了，罪名是大闹隔离室，思想反动。那名工宣队员得意洋洋地宣布：“你要自由，现在让你到拘留所去自由吧。”

这样又过了两三个星期，大概到了10月底的一天晚上，庄明玉和刘家国又到隔离室来找我谈话。刘家国宣布：明天要开宣判大会，宣判对“胡守钧小集团”成员的处理决定，问我还有什么交代没有，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否则，明天一宣判，就悔之晚矣。

这又是吓人战术，我不理睬他。我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香烟，慢条斯理地顿着烟头，点上火，漫不经心地吸着，不讲话。

“你这是什么态度，想顽抗到底是吗？”刘家国沉不住气，发火了。

“是不是不准抽烟？我本来就不抽烟，只不过解解厌气，近来才买上几包抽抽。既然不准抽，我不抽就是了。”我故意将线搭错。

“不是说抽烟是态度不好，你看，我自己也抽烟。刘师傅是要你交代问题。”毕竟庄明玉比较老实，他赶快解释道。

“我没有什么问题好交代了，就等着明天宣判吧。”我不软不硬地回答道。

刘家国怒目而视，有火无处发。

第二天下午在江湾体育馆开了宣判大会。将胡守钧定为反革命份子，当场戴上手铐，由公安局带走。周谷声、邱励欧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有些人定为反革命性质，但帽子拿在群众手里，暂不戴上，以观后效；有些是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些是犯严重政治错误；有些则说因为坦白交代得好，不作处理。真是五花八门，花样繁多。据说这叫体现政策，要全市各单位照这个样板来办理。

我等待着对我的宣判，看看他们能玩出什么花样。但始终没有提到我的名字，好像已经忘掉我这个被拉上台去批斗过的第四号人物。这使我很奇怪。但转而一想，觉得也有道理。判得重了，没有材料，难以服众，——这大概还是托了“样板案”的福，使他们还有所顾忌；判得轻了，不合第四号人物的身份。干脆不宣判，这叫做“挂起来”，使人摸不着头脑。但“挂着”对我是很不利的，他们可以没完没了地继续审查。这场持久战还要拖下去。

宣判会之后，不管是戴上帽子的或不戴帽子的，一个个都放出隔离室。既然是群众监督，就要到群众中去。只有我还关在隔离室里，看来要把牢底来坐穿了。

一个星期之后，专案组通知我说，明天要押送我到干校去，进行劳动改造，并且由工宣队押着，让我回家取一些下乡需用的生活用品。

从校本部到教师宿舍这条过去每天都要走的道路，已经有八个多月没有走过了，现在感到有点陌生。路上的行人有许多是熟悉的，现在见到我，都投射过异样的眼光。走进宿舍，许多小孩子跟在后面指指点点，仿佛看到一个怪物。

回到家里，打开房门，一股霉味扑鼻而来。环顾屋内，书籍、衣服、家具都长满了白毛。

这就是我的家！

我的家已成了这个样子！

我所住的是日本式房屋的底层，根本没有防潮设施，平时就潮得厉害，何况关闭八个多月不通风呢！工宣队在我的学生家中抄出我的一封信，因信中写道：“我下乡劳动刚回来，来信躺在我这发霉的房间里已经好几个星期了。”这句话被专案组上纲上线，定为反社会主义言论。我辩解道：“我的房间确实潮湿发霉，凡住这类房子的人均可作证。”但工宣队硬说我说的不是具体住房发霉，而是暗指社会主义制度发霉。当时住同类日本式房子的人虽然很多，平时也都埋怨太潮湿，但此时没有人敢出来作证。这也难怪，他们知道，这不是说理的地方，也不是说理的时候，谁敢据实直说，谁就是为反革命份子辩护，他本人也会成为反革命份子。人们干嘛要引火烧身呢？我很能理解他们的处境，其实也并不指望有人能出来说话。

但今天面对满室霉点白毛，我还是有几分激动。我倒不是惋惜这些家具、书籍、衣物，人到了这个份上，前途命运未卜，哪里还在乎这些身外之物！只是，我想让跟班的工宣队员看看，我的房间是真霉还是假霉，我信中的话是写实还是象征。虽然我几经暗示，他们却根本不接腔，也不知是真痴还是假呆，但态度却极好，说：快打扫收拾一下，还不知什么时候再回来。

我无法仔细打扫，只约略清理了一下，收拾了几件衣物用品，就跟工宣队回隔离室了。

□ 来源：吴中杰：《复旦往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

#### 【研究动态】

美国中文学术季刊《记忆·REMEMBRANCE》创刊

• 王复兴 •

美国中文学术季刊《记忆·REMEMBRANCE》已于2019年9月10出版、发行第1卷第1期。该学术季刊的研究范围是中国现代史及文革史。该季刊由《美国华文记忆出版社》（简称《美国华忆》）出版并发行。《美国华忆》已于2019年6月注册成立并开业。该出版社将首先出版发行实体版（包括纸版和电子版）的中文国际学术季刊《记忆·REMEMBRANCE》。

《记忆》季刊的前身是中国民间2008年9月创办的同名的电子刊物。11年来，这一刊物已出版263期，发表了2,000多篇中外学者、毛时代政治运动的亲历者以及民间资料收藏家关于毛时代，尤其是文革的论文、杂文、回忆录、历史文献以及读者的讨论与来信。

《美国华忆出版》发行的《记忆》季刊是原电子版的学术升级版，其特点是面向全球，侧重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尤其是文革学的学术研究。原《记忆》电子版将由半月刊改为月刊，作为《记忆》的大众普及版继续在中国国内通过互联网在民间发行。

从第二期始，美国季刊《记忆》将有23名中外学者出任季刊的编委。其名单如下：

主编：启之

副主编：乔晞华

编委：董国强（复旦大学）Guoqiang Dong (Fudan University, China)

葛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Karl Ger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SA)

韩丽娜（弗莱堡大学）Lena Henningsen (Freiburg University, Germany)

何若书（耶鲁大学）Denise Ho (Yale University, USA)

金光耀（复旦大学）Guangyao Jin (Fudan University, China)

李洁（哈佛大学）Jie Li (Harvard University, USA)

李悦歆（牛津大学）Jennifer Altehenger (Oxford University, UK)

梅嘉乐（海德堡大学）Barbara Mittler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Germany)

潘鸣啸（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Michel Bonnin (EHESS, France)

裴宜理（哈佛大学）Elizabeth J. Perry (Harvard University, USA)

秦晖（清华大学）Hui Qin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单少杰（中国人民大学）Shaojie Sha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施敏（密歇根州立大学）Aminda M. Smith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USA)

孙沛东（复旦大学）Peidong Sun (Fudan University, China)

唐少杰（清华大学）Shaojie Tang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魏昂德（斯坦福大学）Andrew G. Walder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魏格林（维也纳大学）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University of Vienna, Austria)

文浩（科隆大学）Felix Wemheuer (University of Cologne, Germany)

吴一庆（多伦多大学）Yiqing Wu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萧小红（法国国家东方语言文化学院）Xiaohong Xiao-Planes (INALCO, France)

叶维丽（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Weili Y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USA)

印红标（北京大学）Hongbiao Yin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余凯思（柏林自由大学）Klaus Mühlhahn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Germany)

附：季刊《记忆》2019年第1卷第1期目录如下：

〔发刊词〕

〔专稿〕

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单少杰

关于“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探微——赵 园

文化大革命的三次发动——印红标

〔研究〕

建政初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构想的提出与终结——郭予庆

文革前的阎红彦——云南文革人物述评——周孜仁

风中的呐喊——一位公社干部的内心世界（1958—1970）——姜成洋

〔评论〕

被忽略的历史——重视对文革保守派的研究——李逊

对“三角游戏”与“最后胜利者”的讨论——何蜀

文革中的造反派是什么人？——徐友渔

〔往事〕

“猴子被吓住，鸡却没有死”——我的母亲刘衡——刘新华

独酌翁杂忆——情爱篇——梁沪生

追忆三线“五·七”厂——马昌海

北师大二附中“八二五”惨案概述——季烨

〔序跋〕

信史：在民间不在府衙——启之

借鉴前覆、展望未来——乔晞华

〔综述〕

文革时期省级领导干部沉浮录——石名岗

〔投稿须知〕

——《美国华忆出版社》、美国中文学学术季刊《记忆》对外联络部主任：王复兴报导

2019年10月16日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